



上篇

所谓“清华学派”

在近代中国学术史、思想史上，究竟存在不存在一个学派是可以称之为“清华学派”的呢？我想，那答案或许应该是在疑似之间。

——何兆武

“清华学派”综说

○程钢

“清华学派”的基本特色是“会通”。……会通是一种文化态度，它放弃以对立为特征的激进态度，而是要化对立为建设性的批判，主张同情的理解，吸收对立双方之长，创造超越对立双方的新文化。

程钢

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，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副主任。研究方向：清代学术史，国际汉学（中国思想史研究），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研究。



什么是“清华学派”？

《辞海》上这样定义“学派”：“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。”这一定义着眼于不同派别的特殊性，在谈论“清华学派”时，大多没有采用这个定义。为此，我们先对自己使用的“清华学派”一词加以界说。

所谓“清华学派”，是指清华精神在学术层面上的体现。这一界定有两个特点：（1）清华精神与“清华学派”之间没有截然的界线。（2）“清华学派”有显性学派与隐性学派之别，后者并不限于人文领域，而是弥漫在大学各个学科乃至各个环节中的精神特质。清华人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多个领域都曾有所贡献，这些贡献并不是偶然的和零碎的，它表现出共同的背景，这个共同背景就包含清华的大学文化。

“清华学派”，可以有广狭两义。广义即为清华精神的学术表现，狭义则是与某个具体学科相关联的学术谱系。学界多在狭义上使用，但用法不一。“清华学派”一词最早由王瑶提出，针对的是清华中文系。徐葆耕则泛指清华人文学科（以中文系、外文系为主），张岱年、胡伟希

专用于清华哲学系，李伯重专门研究过史学中的“清华学派”。这些研究均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。

现在比较缺少的是对广义“清华学派”的研究。现有研究多以具体人文学科分支作为对象，这样的研究，忽视了“清华学派”的特殊情况。第一，梅贻琦等人的大学理念与教育思想无法纳入“清华学派”。第二，置清华的理工科于学派之外，一般说来，理工科不太讲学派，但并不是没有风格、没有学派，我们姑且称之为隐性学派。隐性学派也是一种广义的学派。例如吴良镛的广义建筑学，与清华的传统和精神之间具有非常显著的关联。至于理工科的其他学科，一定还会存在类似的情况。目前，清华的理科、工科与“清华学派”之间的关联，还有待进一步的挖掘。第三，现在流行一种“清华学派终结论”，其立论的基础是将“清华学派”严格限定于人文学科。这种结论只看到院系调整之后清华人文学科的消失，而完全忽视了清华精神在工科以及整个大学文化中的传承，认真讲来，后者是一种隐性的“清华学派”。

“清华学派”（广义）的真正依托，是清华大学百年来形成的一种大学文化类型，清华百年所取得的重要成就，亦往往以这种文化类型作为背景。作为理论形态的学派，要通过各个具体学科来体现，作为精神形态的“清华学派”，其体现与传承方式要灵活得多，并不那么容易“终结”。

“清华学派”的诞生与成长

“清华学派”的历史略可分为三段。

第一段从清华学校成立至1949年，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三小段。一是“清华学派”的准备阶段。在此之前，清华主要目标是培养留学生，学术上不独立，学派意识不强。第二阶段，“清华学派”意识初步形成。“清华学派”意识形成于“转大”（由学校转向大学）过程中。在此期间，正值现代中国文化发生剧烈的转型，五四运动兴起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，北伐战争爆发，直至1928年北伐成功，国立清华大学成立。在此期间，国学院为“清华学派”奠定了良好的基础，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寅恪等为清华的学术气质树立了标尺。第三阶段是“清华学派”理论化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清华大学在多个方面均有所进展：工学院兴起；文史学科特色鲜明，具有清华特色；中文系与外文系重视古今中外的会通；历史系既重精细考证，又重宏观理论；哲学领域的“清华学派”形成，清华精神开始理论化，并产生了以金岳霖、冯友兰、二张（张申府、张岱年）等人为代表的既气质相通、又各具个性的哲学体系。在教育理论上，也产生了以梅贻琦、潘光旦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理念。同时其他学科领域也形成了自身的学术风格。

第二段，从1949年至1976年，是“清华学派”曲折转型的时代。这期间，国家的政治转型对大学提出转型的要求，清华成为纯工科大学。在这一阶段学校的主要领导主要由两部分构成：旧清华的地下党领导人，旧清华的工科教授。因此，清华精神仍然保持了连续性。这一阶段“清华学派”的成就，大多与工程文化有关。其一是在新型工程人才培养理念上的创新，培养了一大批既懂工程、又会管理的人才。其二是由刘仙洲领衔的《清华大学校史稿（1911~1949）》的完成以及刘仙洲对中国机械史的研究。但总体说来，由于缺少人文学科的支持，这一阶段的清华精神难以在学术层面上升为理论。

第三段，从1976年至现在，新的起点。清华大学从纯工科大学转向综合型大学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不断复建。“清华学派”一词产生于这个阶段，这个词不断地唤醒清华人的学派意识，清华精神、清华的大学文化开始受到关注。

“清华学派”的特色

“清华学派”的基本特色是“会通”。近代以来，中国面临着众多的冲突，其中，最根本的是中西文化的冲突。会通是一种文化态度，它放弃以对立为特征的激进态度，而是要化对立为建设性的批判，主张同情地理解，吸收对立双方之长，创造超越对立双方的新文化。这种会通精神表现为4个方面：

中西融会

清华原本是留美预备学校，注重西方文化。从国学院开始，提倡中西融会。可以说，“清华学派”的所有成就，都是中西融会的产物。“清华学派”勇于打通中西，在人才培养方面，外文系培养出了以钱钟书、季羨林等人为代表的中西贯通的名家。另外，清华人一直有一个理想：创办合中外文学于一体的文学系，这个理想的基础就是中西融会，但由于条件所限，一直没有付诸实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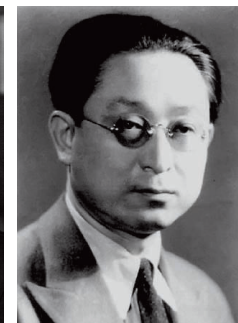
近代以来，承认中国落后、需要融会中西，是各家各派的共识。在融会中西时，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：中西是否有优劣之分？五四激进思潮的主要前提是：中西文化有优劣之分。他们将“中”等同于古代，“西”等同于现代，认为现代优于古代。保守的“中体西用”派并不完全排斥西学，但强调中学为体，西学为末，中高西低，地位分明。有不少清华学人反对将文化分高



冯友兰



张岱年



张申府



顾毓琇

顾毓琇不仅是科学泰斗，也是文坛翘楚。一生创作的诗词歌赋达7000余首，并且对戏剧、音乐也都有很深的造诣。

石城西峙大江东去 豪华一代风流
朱雀桥边金鸡巷里 归朱燕子知休
曾泛后湖舟 忆落霞玄武 鹭逐鸥游
花雨亭台 莫愁居处 总生愁

云山洗眼明眸 看飞花易聚 落叶难留
金粉胜朝胭脂古井 谁人凭吊悲歌
扶醉上楼头 笑仰天螭蚁 怀古夷犹
何若焚香煮茗 闲赏百花洲

望海潮

○ 顾毓琇

低的观点，最著名者有冯友兰、二张（张申府、张岱年）。冯友兰认为，中西文化不存在孰优孰劣，也无须判断孰优孰劣，而是要彼此补充。

“我们比较和研究中国和欧洲的哲学思想，并不是为了判断孰是孰非，而只是注意用一种文化来阐明另一种文化。”张岱年还提出了“文化析取论”。他认为，文化不是生物有机体，而是某种组合物，是可析取的。各部分（不是整体）地位平等，相对独立，可以重新拆装，创造出新的文化，这就是“综合创新论”的主要内容。

一般认为，在科学领域，西优于中，毋庸置疑。在科学领域，以使用外文原文教材为荣，一时成为名校的风气。刘仙洲却认为，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基础。语言平等，并无优劣之分。若专业术语不能中国化，“我国学术永无独立之期，国将不国”。于是他大力提倡、亲自带头编撰中文教材，从事中文机械术语统一的工作，1934年出版有英汉对照的《机械工程名词》（初版）。

古今贯通

民国初年，正赶上文化剧变的时代，外在环境的迅速变革与内心价值的追求稳衡，构成一对矛盾。如何看待古代传统，在古代与当今之间建立起连续性，是当时的重大问题。在这个问题上，“清华学派”贡献颇多。其中，中文系在现代汉语言文学与古典研究之间达成了健康的平衡，历史系既坚持传统的细密考据（陈寅恪等），又提倡宏观的理论视野（雷海宗、蒋廷黻

等），并将两者有机结合，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，均在国内独树一帜。在古今贯通的理论化方面，比较著名的有陈寅恪提出的以“同情了解”为特色的中西融会学说和冯友兰的“释古说”。
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外来学说影响很大，很有吸引力，但以这些学说为根据来改造中国社会，均有顽强的阻力。陈寅恪认为，问题出在两个方面：一方面，要以正确的方式认识本民族文化的价值，为此他提出了“同情了解”的原则，意思是要认识古代学说在当时历史情境下的真意，而不是抽象的普泛涵义；另一方面，“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，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。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，……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。”
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激进主义流行，疑古思潮影响很大。这一派的优点在于消解迷信传说，其不足则在于长于怀疑，建设意识不足。冯友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多次阐述他的“释古”观。他将当时研究中国古史的观点分为信古、疑古、释古三派，并认为信古、疑古、释古为研究中国古史研究进化发展的三个阶段。释古“介于信古与疑古之间”，“释古”是“信古与疑古这两种态度的折衷”。

文理渗透

一是以文理平衡为教学导向，培养出大批具有良好人文修养的科技大家。顾毓琇既是杰出的技术科学家，又是诗人、戏曲家、教育家、社会活动家，是现代中国罕见的文理兼通的全才。有一阶段，清华出现偏向理工科的风气，梅贻琦校长为此指出：“理工方面固应亟谋发展，但于文法各系也要使它有相当的进展。”在这种文理平衡、全面发展的氛围中，入学时以文史见长、理科不好的钱伟长，出于科学救国的热情，转学理科，后成为杰出的科学家。一般视为文科的哲学系培养出王浩这样的数学家与哲学家。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，可谓绝无仅有。

二是反对“半人”教育。清华以科技著称，但却能充分认识到人文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，这与清华的传统有关。从一开始，清华人就对科学的两面性有所认识。梁启超早年拥护变法维新，崇拜科学技术，一战结束后赴欧考察，著有《欧游心影录》，认识有所转变，对科技这把双刃剑有了全面的认识。1923年2月，张君勱在清

华大学作了题为“人生观”的演讲，对“科学万能”的倾向提出了批评，得到梁启超的肯定。这篇演讲词发表于《清华周刊》上，从而引发了中国现代史上一场影响深远的“科玄论战”。国学院导师王国维有句名言：“可信者不可爱，可爱者不可信。”其中，可信者喻指科学，可爱者喻指人文。金岳霖是中国现代逻辑学科的创建者，他对科技的冷漠特性深有反思，主张要使“科学与工业人化”。梅贻琦与潘光旦认为，工业化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“使工科教育于适度的技术之外，要取得充分的社会化与人文化”。1947年，建筑学家梁思成提出，我们不能培养只懂技术不懂人文的人才，并借用美国某大学校长的话，称之为“半人”，即不完整的人。并将由“半人”掌管的世界称作“半个人的世界”。梁思成的讲演给吴良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成为吴良镛“文革”结束以后推动广义建筑学的思想契机。所谓广义建筑学，是要破除建筑学等同于建筑技术的陈见，将建筑看成是人居工程，让科技与人文相互融通。在吴良镛的提倡下，人文学院的社会学家与建筑学院合作，共同探索科学与人文相通之道。

文实会通

清华人不但在文史哲等具体领域内做出了会通型的贡献，在大学理念方面，清华也有独到的贡献，这就是创办了文实会通的大学。

清华最初是文理科大学（简称文），工科（简称实）的地位是很低的。有一段时间，清华董事会甚至想取消工科。1930年代初，清华大学办学理念发生重大转变，开始创办工科。清华大学工学院是在梅贻琦的主持下创办的，他1931年就任校长，立即组建清华工学院。为了加强协调力度，梅贻琦在初建时自任院长，工作走上轨道后，立即让贤于顾毓琇。

这件事对“清华学派”有极大的影响。兼办文理与工科的大学，在西方也极为罕见。在当时的中国，有知名的文理大学，如北京大学；也有著名的工科大学，如北洋大学、交通大学。清华大学综合了两种大学类型，创造了一种新的大学类型，这是“清华学派”在大学教育领域的重大成果。

关于大学的目标，有学术论与功用论之分。前者强调大学的目标是研究高深学问，后者强调

大学应承担服务社会之功能。重视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，是梅贻琦的一贯立场。梅贻琦指出：

“清华大学之教育方针，概括言之，可谓为造就专门人才，以供社会建设之用。”在当时的中国，对大学来说，最大的建设需要，莫过于创办工科，富国强兵。在著名的《大学一解》中，梅贻琦将大学的使命概括为“明德”与“新民”两项，其中，“新民”是社会服务这一提法的拓宽与提升。如何培养国家所需的工程人才？梅贻琦清醒地认识到，“人才问题又可以分为两方面，一是组织人才，一是技术人才。近代西洋从事于工业建设的人告诉我们，只靠技术人才，是不足以成事的，组织人才的重要至少不在技术人才之下。”为了培养技术与组织能力兼备的人才，必须有很强的人文教育作为支撑。“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，对于心理学、社会学、伦理学，以至于对于一切的人文科学、文化背景，都应该有充分地了解。”

1949年后，新中国极其重视工业化，为清华的工程教育提供了宏大的历史舞台。院系调整后，蒋南翔出任校长，以工程教育家刘仙洲为副校长（后为第一副校长）。刘仙洲于1932年前来清华以前，1925年在北洋大学校长任上就曾指出：“学校之造就人才，原所以备社会之用，故社会上需要何项人才最急，学校即应设法以应之。”在这一历史阶段，由于整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偏差，人文教育较弱，但蒋南翔校长还是结合工科实际，注意理工结合，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（政治品质、组织才能与文体才能），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，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实会通。

《大学》云：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”清华人推崇“人文日新”。近代中国的大学发展，是沿着“之”字形向前发展的。对清华来说，无论是成立工学院，还是院系调整、改革开放后的综合化，都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关联。1928年北伐胜利，清华变为国立清华大学，校长罗家伦称之为“新清华”，这个“新”指国民革命之新；1949年之后，蒋南翔出掌清华，将清华校报命名为“新清华”，这个“新”，指的是社会主义革命之新。这些都是“人文日新”精神的反映。回顾“清华学派”的历史，其实总体上就是一个文化会通综合、不断日新的过程。📖